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总主编 张柏然

文化翻译读本

Selected Reading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主 编 辛红娟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总主编 张柏然

文化翻译读本

主 编 辛红娟

副 主 编 吴 莎 汪璧辉

参编人员 廖 晶 郭 薇 袁 圆 马孝幸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读本 / 辛红娟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 张柏然总主编)

ISBN 978-7-305-10396-4

I. ①文… II. ①辛… III. ①文化—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071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总 主 编 张柏然

书 名 文化翻译读本

主 编 辛红娟

责任编辑 裴维维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386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396-4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

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

顾 问(按首字母排序)

- | | |
|-----|----------|
| 黄国文 | 中山大学 |
| 廖七一 | 四川外国语学院 |
| 潘文国 | 华东师范大学 |
| 王宏印 | 南开大学 |
| 王克非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谢天振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许 钧 | 南京大学 |
| 仲伟合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总 序

张柏然

到了该为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说几句话的时候了。两年前的炎炎夏日,南京大学出版社责成笔者总揽主编分别针对高等院校翻译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与研究需求的研究型系列读本和导引。俗话说,独木难撑大厦。于是,笔者便千里相邀“招旧部”,网罗昔日在南大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十八罗汉”各主其事。寒来暑往,光阴荏苒,转眼两年过去了。期间,大家意气奋发,不辞辛劳,借助网络“上天”,躲进书馆“入地”,上下求索,查阅浩瀚的文献经典,进而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披沙拣金,辨正证伪,博采众长,字斟句酌,终于成就了这一本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教材。

众所周知,教材乃教学之本和知识之源,亦即体现课程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甚至教学模式的知识载体,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引导教学方向、保证教学质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高校组编、出版的翻译教材逐年递增。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检索主题名含有“翻译”字段的图书,检索结果显示,1980至2009年间,我国引进、出版相关著作1800余种,其中,翻译教材占有很大的比重。近些年来,翻译教材更是突飞猛进。根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共有1000多种。^{*}这一变化结束了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教材“一枝独秀”的境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由此也反映了我国高校翻译教学改革的深化。

但是,毋庸讳言,虽然教材的品种繁多,但是真正合手称便的、富有特色的教材仍属凤毛麟角。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其中大多都具有包打翻译学天下的纯体系冲动,并没有打破我国既往翻译教材编写从某一理论预设出发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和几大板块的框架结构。从教材建设看,我国翻译理论教材在概念陈设、模式架构、内容安排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雷同化现象。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进,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有鉴于此,我们组编了“大学翻译学研究型系列教材”和“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这两套系列教材。前者系研究生用书,它包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当代西方文论与翻译研究导引》、《翻译学方法论研究导引》、《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导引》、《文学翻译研究导引》、《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英汉口译理论研究导引》、《语料库与翻译研究导引》和《术语翻译研究导引》等10册;后者则以本科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它包括《翻译概论读本》、《文化翻译读本》、《文学翻译读本》、《商务英语翻译读本》、《法律英语翻译读本》、《传媒英语翻译读本》、《科技英语翻译读本》、《英汉口译读本》、《英汉比较与翻译读本》和《翻译资源与工具读本》等10册。这两套教材力图综合中西译论、相关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语

^{*} 转引自曾剑平、林敏华:《论翻译教材的问题及编写体系》,《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11月。



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语料库翻译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结合目前高校翻译教学和研究实践的现状进行创造性整合,编写突出问题型结构和理路的读本和导引,以满足翻译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与研究的需求。这是深化中国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尚未引起翻译理论研究界和教材编写界的足够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课题,基本上还是一片多少有些生荒的地带。因此,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就多少带有拓荒性质。这样,不仅大量纷繁的文献经典需要我们去发掘、辨别与整理,中西翻译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需要我们去探讨,而且研究的对象、范畴和方法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与确定。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这一课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却又变为克服困难的巨大动力,策励着我们不揣浅陋,迎难而上,试图在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编写这块土地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垦殖。

这两套研究型系列教材的编纂目的和编纂特色主要体现为: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是培养学生发问、好奇、探索、兴趣,即学习的主动性,逐步实现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及早进入科学研究阶段;不追求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突破讲授通史、通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引入探究学术问题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教材编写理念,填补国内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的欠缺;所选论著具有权威性、文献性、可读性与引导性。具体而言,和传统的通史通论教材不同,这两套系列教材是以问题结构章节,这个“问题”既可以是这门课(专业方向)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是这门课某个章节的主要问题。在每个章节的安排上,则是先由“导论”说明本章的核心问题,指明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接着,通过选文的导言,直接指向“选文”——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的范文,这样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更有示范性;“选文”之后安排“延伸阅读”,以拓展和深化知识;最后,通过“研究实践”或“问题与思考”,提供实践方案,进行专业训练,希冀用“问题”牵引学生主动学习。这样的结构方式,突出了教材本身的问题型结构和理路,旨在建构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与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年轻学子有机会接触最新成就、前沿学术和科学方法;强调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交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方法,未来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需要。

笔者虽说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但对编写教材尤其是研究型教材还是个新手。这两套翻译学研究型教材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全有赖各册主编的精诚合作和鼎力相助,全有仗一群尽职尽责的编写和校核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套系列教材的最后编辑工作中,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董颖和责任编辑裴维维两位女士全力以赴,认真校核,一丝不苟,对保证教材的质量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谨向他(她)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而言之,编写大学翻译学研究型教材还是一项尝试性的研究工程。诚如上面所述,我们在进行这项“多少带有拓荒性质”的尝试时,犹如蹒跚学步的孩童,在这过程中留下些许尴尬,亦属在所难免。作为教材的编撰者,我们衷心希望能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日后再版修订,进而发展出更好更多翻译学研究型教材来。

是之为序。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撰于沪上滴水湖畔临港别屋

前 言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实践活动及由之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文化是由相互联系的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要素的简单聚合、堆砌,而是由各组成要素按特定方式结合成的,从而具备某种性质和功能的大系统。人类的传统文化不是恒定的,人的文化创造由于主体的积极建构作用会不断地增加进新的现实成分。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社会差异的实质是文化的差异。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不断地见面、碰撞与交融中进行的,这体现了文化的普遍内在需求和特征。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翻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一个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的行为,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

语言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已经告诉我们,语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纯工具性和纯符号性的意义仓库,而是和意义血肉难分的统一体。一切文化和思想等的存在,就是语言性的。我们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就意味着语言与人的存在休戚与共的性质。具体一点说,在任何一个或者一组语言符号的后面,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格外复杂的语义内容,往往充满文化的张力和意义的历史对话性。面对复杂的语言关系局面,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关于世界的存在和人对其意义理解差异的关系问题。而翻译行为也就必然地演化成为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意义阐释和对话行为。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人类翻译实践行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融汇和传播的过程。我国大多数文献在使用“文化翻译”这一术语时,其所指含义是“原文中特有文化内容或因素的翻译”。翻译作为语际转换,以其独特的方式或抵抗或引进原语文化,从而达到塑造源语文化或异域文化的目的,因而势必对国家和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为培养学生的翻译文化研究意识,编者遵循“大学本科翻译研究型系列读本”的编纂目的与编纂特色,突出问题型结构和思路,辑录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翻译研究学术论文,以资作为研学的指导和依据。该分册共8章,每章由“导论”、



“选文”、“延伸阅读”和“问题与思考”四大部分组成。编者围绕章节“导论”所述相关专题的主要内容,选取翻译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依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准则,结构“引文”部分。“延伸阅读”部分旨在为有志于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深造的学生拓展研究视域,并通过“问题与思考”检验学生对该章主要问题的熟习程度。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① 文化翻译研究概论篇;② 文化语词翻译篇;③ 文化意象翻译篇;④ 文化典籍翻译篇;⑤ 文化翻译策略篇;⑥ 文化身份构建篇;⑦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篇;⑧ 文化转向反思与展望篇。

本教材从整体内容上可划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文化翻译研究概论篇”简述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第二、三、四、五章分别讲述文化语词、文化意象和文化典籍在跨语际、跨文化交际中的传递和保真,以及为实现文化保真译者所面临的策略与方法抉择;第六、七、八章则从宏观视角分析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学学科建设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何去何从,描述翻译过程中人们对于身份认同和身份构建的关切。

本教材所选文章严格依据经典性和权威性原则,均为历经时间淘拣积淀而来的文化翻译学论述,力图清晰、全面地为学习者展示相关题旨的概貌。选文主要选取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力图较全面地体现国内翻译学界在国际译学文化转向大潮中的权威思考。本书既可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有志深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年轻学人开展自主学习和研究用书。

本教材在厘定框架、选文审定和编写的整个过程中,无不刻印着导师张柏然教授的学术点拨与指导,诚挚感谢学术成长道路上张柏然教授所给予的教诲与引领。感谢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本书编写提供时间上的保证,感谢中南大学 MTI 教育中心和英语系同仁们工作上的支持与配合。同时,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为本书刊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本教材中所引文献大部分已获得原作者的使用授权,对于个别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的选文,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和由衷的感谢。为表示对原作者的敬意和谢忱,选文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文的本相,因此在外国学者姓名的汉译方式上会有些微不同,为此给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我们谨表歉意。

编者学术视界所限,选文偏颇或行文不当之处,还请就教于方家。

辛红娟

2012 年 7 月于湖南长沙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翻译研究概论篇	1
导 论	1
选 文	3
选文一 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3
选文二 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9
选文三 翻译——对外来文化的阐释	15
选文四 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	18
延伸阅读	24
问题与思考	25
第二章 文化语词翻译篇	26
导 论	26
选 文	28
选文一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词义的确立	28
选文二 文化内涵词——翻译中信息传递的障碍及其对策	32
选文三 政治词汇的文化内涵及其语言策略	39
选文四 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	47
延伸阅读	57
问题与思考	58
第三章 文化意象翻译篇	59
导 论	59
选 文	60
选文一 意象的传译	60
选文二 从“蟋蟀”和“杜鹃”看词语的文化传统	66
选文三 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	73
选文四 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	81
延伸阅读	87
问题与思考	88
第四章 文化典籍翻译篇	89
导 论	89
选 文	91
选文一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	91
选文二 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研究——以英美翻译家的汉籍英译为例	97
选文三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106



选文四 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	114
延伸阅读	121
问题与思考	121
第五章 文化翻译策略篇	123
导 论	123
选 文	125
选文一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	125
选文二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	131
选文三 译者的文化选择与翻译策略	136
选文四 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对国内归化/异化论者的一个提醒	140
延伸阅读	145
问题与思考	145
第六章 文化身份构建篇	146
导 论	146
选 文	147
选文一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147
选文二 论译者的身份	156
选文三 殊途不同归——论译本作为译入语文化产品的意义	163
选文四 后殖民语境与翻译中的民族身份构建	167
延伸阅读	173
问题与思考	174
第七章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篇	175
导 论	175
选 文	177
选文一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兼评《翻译文化史论》	177
选文二 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183
选文三 “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范式	188
选文四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194
延伸阅读	202
问题与思考	202
第八章 文化转向反思与展望篇	203
导 论	203
选 文	205
选文一 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205
选文二 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	212
选文三 “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	218
选文四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228
延伸阅读	236
问题与思考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37

第一章 文化翻译研究概论篇

导 论

张今教授在其专著《文学翻译原理》中对“翻译”作如下界定：“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此说是国内较早从超语言层面对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行为的论述，明确指出人类翻译行为的文化使命。

哲学诠释学认为，翻译形式上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解释与对话。语言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我们总是处于语言所构筑的世界之中，学习语言就是学习一种生活方式，学习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从符号学的意义之维看，翻译是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化、同一语言中的一些语言符号向另一些语言符号的转化、一种语言的语符向另一种语言的语符的转化，这些转化是应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

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美尔(Hans J. Vermeer)基于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论证说，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这一文化交流行为具有如下四种功能：① 促进文学发展；② 影响译入语文化对外来文化规范的接受和吸收；③ 促进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④ 从理论和实践上促进文学翻译和诗学规范的形成。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是有着明确目的的人类文化行为。

文化包括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两个方面，思维活动及与之相连的语言文字不仅有全人类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民族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翻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同时，势必会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及所处时代的特殊需要去理解、阐释。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翻译作品不单纯是文本，而是体现某种文化意义的文本。翻译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它不仅表现为两个意识的对话，同时也表现为两种文化的对话。首先，翻译过程是翻译者意识和原作者意识的交流和撞击，但翻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为任何一种或一部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当翻译家的意识进入作品时，他就进入了一种文化的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照、比较、体验与领悟。

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学者们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简单解码-重组过程，而且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的行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因素。文化翻译学



研究涉及从待译材料选择到译文在新语境中的接受的整个过程,把研究视野从微观的翻译过程拓展到宏观层面。翻译作为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在两种语言、文化间穿行,跨越不同的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翻译虽然时常外化为个人的书写实践,但其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

从历史上看,翻译大多是从异域吸取有价值的思想文化之精华传入本族文化,并长久地、深层次地影响本族文化。例如,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不仅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新的宗教思想、人生哲理,也带来了新的语汇、概念和文学形象。翻译在语言平台上进行,而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不说所载内容,就是载体本身也富有文化内涵,并在词汇、语义、语用、修辞等多个层面体现出来。当翻译使两种语言发生转换时,原有内容多少发生变化,载体则完全改变,形成新的结合,翻译因而成为两种语言、文化的结晶。

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产物,也是促使文化繁荣和变异的要素。翻译使文化具有“杂交”和超越的优势,所形成的翻译文化是本土文化同外域文化互动的结果。例如美国诗人、翻译家庞德曾“翻译”了不少唐诗,其译作虽历来多有争议,但在美国诗歌发展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引发了新诗运动。唐诗也因此在国外他乡获得新生命,或生命的延续。翻译作品是他语言文化与本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译作进入异域,必然会与新文化环境发生关系,或融合,或抗拒,或若即若离,或衍生蜕变,但无论遭遇何种际遇,都会不同程度地使两种文化联系起来,成为它们之间的永恒媒介。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介质,作用在于将源语中体现的文化移植到陌生的目的语文化中去。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因此,用一种语言文化再现另一种语言文化时,译文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

本章选文以谭载喜教授《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切入对“文化与翻译关系”这一宏观命题的论述,从翻译史的角度阐述中西方各主要翻译高潮期与各自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一文借助英汉、俄汉转换实践,说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活动本身,作为一种活动过程,还是作为一种活动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味,此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翻译——对外来文化的阐释》与《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则立意显阔,分别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和文学翻译批评的角度,分析指出外来语词接受和文学接受呼吁学术界跳出对欧美理论的简单借用和挪用,建立能够彰显外汉互译特色的文化翻译理论体系。



选文一 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谭载喜

导 言

本文选自《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选文开篇弘义,指出“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把中西翻译传统置于各自的社会文化体系内加以讨论,以期阐发各个翻译理论和实践传统无不受制于所属社会文化传统的理念。文章对中西方翻译传统中各个主要发展与演进阶段如何受各自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分别作了概括性回顾。文章认为,中西翻译实践和理论传统之所以互不相同,是由于作为各自发展先决条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等方面的互不相同。但文章最后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世界上各社会文化体系对各自翻译传统,特别是译论传统的影响将逐步趋于弱化,而非逐步强化。

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陈述出这许多的差异有哪些,那么我们的研究未免过于肤浅。要使中西翻译传统的比较研究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可停留在对于表面差异的陈述,而更应该透过表面,去挖掘深层的根源。这里的理念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思想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上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社会文化的特征。

—

在翻译实践的层面,中西方各自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翻译的需求,往往成了翻译事业发展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翻译理论的层面,中西方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哲学的发展,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中西方的社会文化不同,思想哲学不同,因而对于各自翻译传统发生的影响也自然不同。回顾中西方翻译传统的各个发展与演进阶段,人们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发展和演进阶段,没有哪一个独立于与之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文化体系而存在的。

在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之前,翻译(且主要为口译)的作用多见于皇廷,见于接待觐见皇帝或前来进贡的“蛮国”使臣。“中央之国”的文化远远高于周边“蛮族”文化,它的生存与发展无



须依赖于外来文化的翻译引进。到了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地主豪强兼并勾斗,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因为,一方面,挣扎在极苦世界的农民大众渴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慰藉,冀求神明能救芸芸众生于苦海深渊。另一方面,地主豪强、皇族宦吏等统治阶层也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冀求万能的神明保佑自己长命百岁。

佛教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宣扬因果报应;宣扬人的悲欢离合皆因前世所定。而所有这些,既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和劳苦小民企盼宗教的心态,又符合“天人合一”、“富贵有命”、“听天由命”等中国人业已普遍接受的儒教、道教的思想传统。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受到欢迎,佛经的翻译也因此受到广泛重视。自公元148年西域高僧安世高于洛阳开佛经汉译之先起,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佛教稳步进入华夏大地,并通过与儒教、道教、玄学的交织融合,而很快完全演化成为一门国教。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佛经翻译高潮迭起,经久不衰,于唐宋时期达到顶峰。

唐宋以后,佛经翻译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且一蹶不振。究其原因:一是到唐宋时期止,凡是值得翻译的经文典籍几乎全部有了中文译本;二是由于佛教早已在华夏安家落户,人们更愿诵读由汉语撰写的经文,而无须依赖译自外文的读本;三是唐宋之后,外来入侵频繁,国家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饱受战乱滋扰,大规模的翻译盛事便无从谈起。当然,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战乱不断而全无翻译活动可言。事实上,在唐宋之后的辽、金、元乃至明、清各代,中国国内各民族语如汉、蒙、藏、满之间的翻译交流,比唐宋时代各民族语之间的互译更为发达。但就诸如佛经翻译之类涉及异邦文化的翻译活动而言,自唐宋之后至明末清初,前后大约五百年,中国似乎处于一个停顿状态。直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而且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并因此引发了中国翻译的另一个主要高潮,即西方科技翻译的高潮。

然而,明末清初的这一西方科技翻译高潮为期不长。由于朝廷的恐洋排外,中国逐步从泱泱开发之邦,转变为孤立封闭之国,对外交流被终止,一切翻译工作也就失去了市场。百余年的不思进取和闭关锁国,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竭和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战败的耻辱震撼了朝廷,更是唤醒了民众。中华民族要雪国耻,图生存,就必须打开国门,向外国学习,向西方学习。于是,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又一个翻译的高潮,一个以大规模引进“西学”为标志的翻译高潮。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举国上下重新认识到,在世界发展逐渐趋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中国再也不能孤芳自赏,再也不能继续与世隔绝,而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扫清障碍,把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统统搬借过来,以便更好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正是基于这么一种社会和需求,中国的翻译事业才得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又一次进入发展的新高潮,这一最新高潮的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广,都是以往任何时候的翻译无法比拟的。

二

以上所要说明的是,翻译事业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制于相关社会文化的需要和发展。中



国如此,西方又何尝不如此?公元前3世纪,罗马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希腊而称雄于西方世界,但在文化上却仍然落后。当时的罗马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学。这样,为了在文化上也赶超希腊,罗马人感到有必要向希腊人学习,有必要首先将希腊人的作品统统翻译成拉丁文。这样,通过翻译,拉丁文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同理,为了满足人们在宗教上的需要,圣经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翻译到了西方的各个语言中。古时的《旧约·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通俗拉丁文本》,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的“民众的德译本《圣经》”、英国的《圣经·钦定文本》,以及当代西方各式各样的民族语版本,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传教与受教需要而产生的。

在12至13世纪,随着阿拉伯作品的流入,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出现了一股阿拉伯学术热。来自欧洲各地的不少文人墨客云集西班牙的中部城镇托莱多,把大量阿拉伯作品(其中主要包括早期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典籍)翻译成拉丁语,从而掀起了西方翻译史上一个特色鲜明的高潮,托莱多也因这一翻译高潮而名振整个欧洲。

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民族地域逐渐划定,民族国家先后出现,民族语言相继形成,各民族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为了更好地巩固民族国家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各国人民要求阅读民族语作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而民族语作品的产生,一方面来源于民族语作者的创作,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民族语译者的翻译。特别在各民族语形成与发展的初期,民族语作者和读者更多的是把目光向着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文化,试图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精神食粮。这样就逐步导致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即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文艺复兴作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恩格斯,1972:445),它的发生标志着西方文明继往开来的大发展。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发展传播欧洲各国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包含并有赖于规模空前的翻译活动”(谭载喜,1991:68)。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贯穿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个过程,而且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之后的17至19世纪。不论是17世纪的古典主义思潮,或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或多或少地有赖于翻译的帮助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因为没有对希腊、罗马古籍的研究与翻译,就不会有文学中古典主义作用;没有对于古典和各国当代作品的研究与翻译,也就不会有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浪漫主义。

到了20世纪,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翻译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翻译的作用,不仅继续体现在宗教和哲学、文学等人文领域,而且越来越广泛的体现在科学、技术、军事、经济、商业等应用领域。欧洲共同体以及随后的欧盟内部日常工作的开展,北约的组成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当今世界寻求建立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等,所有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翻译工作者的劳动才得以实现的。

以上各节清楚说明,中西方的翻译传统之所以互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方作为翻译先决条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环境互不相同。例如,中国第一个翻译发展高潮是佛经翻译的高潮,这是因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或思想内容上,佛教都适于融入中国的社会。换言之,由于佛教产生于毗邻中国的印度,因此很容易传入中国;又由于许多佛教教义如“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现世最苦,来世极乐”等,符合中国人关于“富贵有命”、“生死在天”的人生哲学和传统心态,因此很容易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和接受。

相反,西方翻译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却与此大不一样。首先,构成西方翻译传统中第一发展阶段的古罗马阶段,其翻译的主流是世俗作品而不是宗教作品的翻译。由于古罗马不像古中国,其缺乏自己的文学传统,因此当罗马人战胜希腊人、夺得欧洲霸主地位而发现罗马文化



远不及希腊文化的时候,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翻译借鉴希腊典籍的需要。即便在宗教翻译的领域里,导致西方接纳、接受基督教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导致中国接纳、接受佛教的社会文化条件也是大不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佛教传入中国并得以在中国扎根,是由于佛教与儒教、道教和玄学等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在许多方面彼此相通、相融。而基督教传入欧洲,并不是因为基督教能与西方思想哲学的传统,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通、相融。虽然后来基督教的发展也曾得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哲学的融入,但在彼此的依存关系上,它们与中国的情形是有别的。

中西之间上述这种制约翻译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古代翻译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体现在自古至今的各个翻译发展阶段。例如,制约西方翻译“黄金时代”,即文艺复兴时期翻译,以及随后 17 至 19 世纪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制约中国相应时期翻译,即明末清初科技,以及鸦片战争后政治、文学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彼此是迥然不同的。

三

对于中西翻译传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同,还必须指出以下三点:第一,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 476 年的崩溃之后,欧洲的社会政治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发生巨变,民族国家和民族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地位得以确立,因此,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把古代希腊、罗马作品翻译成各个新生的民族语言,便成了西方翻译传统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不无类似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重要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但中国的这一“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新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是不相同的。因为,西方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欧洲各民族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存在与发展,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使早已具备文学语言地位的汉语现代化,也就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使白话文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书面语言。

第二,中国翻译的主流大都涉及来自中国文化以外的材料,而西方翻译的主流则主要涉及来自西方内部,即西方各民族文化的材料。无须说,华夏大地各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翻译也源远流长。但与涉及异邦语言文化的翻译如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翻译、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解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方位的翻译相比,中华内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翻译并不占据中国翻译传统的主导地位。然而,在西方翻译传统当中,虽然涉及非欧洲语言文化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 12 至 13 世纪在西班牙托莱多进行的阿拉伯语翻译、18 世纪在法国等地出现的中国古典翻译热、19 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名篇《鲁拜集》等,但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涉及西方“内部”语言文化的翻译,其中包括永无止境的对于希腊、罗马典籍和《圣经》的翻译,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各国作品的互译。从这种意义上看,把中国翻译传统称为“外向型”翻译传统,而把西方翻译传统称为“内向型”翻译传统,似乎不无道理。

第三,中西翻译传统就彼此之间的互译活动而言,明显存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在中国翻译传统里,从第二次发展高潮(即:由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引发的科技翻译高潮),到第三次发展高潮(即: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学翻译高潮),一直到目前的发展高潮(即: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规模空前的翻译高潮),翻译的最大特征是:所翻译的原材料大都姓“西”。然而,在西方翻译传统里,虽然也经常出现对中国文化的



翻译热,如18世纪法国、19世纪英国和德国、20世纪西方各国出现的中国文化翻译热,但相形之下,西方翻译中国文化的热忱却远远比不上中国翻译西方文化的热忱,翻译的影响也往往局限在较小范围如文人墨客的圈子里,而不像西方文化的翻译在中国那样,其影响触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当然,此种不平衡的产生,首先不可简单地归咎于翻译热忱上的不平衡,因为按照本文关于不同翻译传统势必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理念,翻译热忱的不同首先是由于制约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不同而引起的。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欧洲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其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各国国势日益强盛;而唐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国势日趋衰落。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西学东渐”多于“东学西渐”的现象,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然而,从纯粹翻译发展的角度看,中西方之间存在的上述这种不平衡,归根结底,它是中国翻译传统对于西方翻译传统的一个优势。这是因为,中国翻译传统对于西方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包容,多于西方翻译传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包容,进而导致中国人通过翻译对于西方的了解,普遍多于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这从长远意义上说,将无疑十分有益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振兴,有益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

四

正如中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了各自的翻译实践,它们也同样影响和制约了各自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发展。亦即是说,中西方翻译的实践传统也好,理论传统也好,它们始终都是更大范畴的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它主要包括科学、宗教和思想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因此,所谓文化传统对于翻译传统特别是翻译理论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也主要是指从这三层面,尤其是思想哲学层面对它的影响和制约。

在传统上,中国人信奉强调天人合一、顺从“天意”、崇尚古人古文、崇拜权威、重形象和悟性思维、重归纳推理、重暗示含蓄、重言简意赅、重以史为鉴、轻形式逻辑、轻空谈假想等的思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这些颇为笼统的思想特征,或多或少地也成了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特征。例如,古代支谦《法句经序》一文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是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植根本族古文化,依靠古圣贤、古权威来加以巩固和发展的最早例证。至于现代严复从古人箴言中悟出“信、达、雅”,则更是说明了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自古一脉相承的“崇古”特性。

在整个中国的翻译理论史上,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实宜径达”,到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的“五不翻”,再到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所有这些思想或观点的表述,或是三言两语、洗炼精到,或是意蕴深邃、高度浓缩含蓄。不论是古代为中国翻译理论“发头角”的支谦或“开宗明义”的释道安,还是在现当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的严复、傅雷、钱锺书,谁都没有就翻译的理论和操作问题展开过全面、系统而详尽的论述,也没有撰写过大部头的翻译专论。然而,正因为言简意赅、洗炼含蓄符合我国文论的特点,所以上述翻译思想和观点的提出,在我国翻译理论传统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接受和认同。特别是严复的《译例言》,通篇不过千余字,论及翻译原则问题的核心文字则不过数百字,却因提出了简洁明了而内涵丰富的“信、达、雅”,而被认为是“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